

皇國推夏白瓜故是年十月美軍劫實巴月

華文起于足提史

陽也

亦執弓徐次之曰

之謹有

張日甲收為

四軌車馬年

庚十月馬美事文四關征

吉人也乃與如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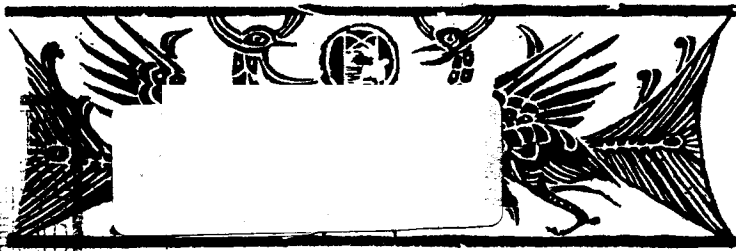
光厚乃粟劍粟中者偶天取卿

架人

许结 著

漢代文學史

許結
于帆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汉代文学思想史

许 结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射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25 字数 3424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305—00651—3

I·43

定价：3.05元

171766/11

代 序

大汉天声远，
推衍风骚统，
陆贾著新语，
贾谊善政论，
绵延黄老学，
仲舒推一尊，
百家如百卉，
齐鲁韩毛诗，
赫赫武皇帝，
民风入乐府，
国威震殊俗，
史赋双司马，
余波犹绮丽，
学术云霞蔚，
大赋张雄略，
余子深含蕴，
辐辏大文化，
上宏周殷夏，
譬如雨露降，
文运岁月长。
汇通南北航。
黜霸在崇王。
法度正典章。
儒道合流芳。
天人感应忙。
各各吐馨香。
今古文垒张。
群说尽包藏。
佳人来金堂。
韵事粲琳琅。
彩笔并天光。
觉醒共腾骧。
长空百鸟翔。
首席列班扬。
异苑各擅场。
千载示周行。
下启魏晋唐。
泽惠溥万方。

人文均称汉， 举世引领望。
粤子早推服， 颇欲究玄黄。
沉潜复涵泳， 屡罢不能忘。
撰此思想史， 幽眇思张皇。
力薄知任重， 还期大雅匡！

许结 于南京大学中文系

目 录

代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肇造期	25
第一节 楚声兴隆与衍解	26
第二节 黄老之学与汉初文风	37
第三节 论说文的政教思想	47
第四节 《诗》学的微言大义及其致用精神	53
第五节 《淮南子》对汉初文学思想的推阐	64
第二章 鼎盛期	78
第一节 藩国地域文学向宫廷统一文学转化	80
第二节 囊括天人的大文化态势	89
第三节 义尚光大的赋体文学观	111
第四节 缘事而发的乐府诗学观	130
第五节 实录与爱奇：《史记》文学思想的一对命题	145
第六节 《毛诗序》与汉代诗学批评形态	161
第三章 转折期	176
第一节 经学思潮与摹拟文风	177
第二节 文化衰变对文学思想转化的促进	184

第三节	以扬雄为代表的两汉之际文学变革思潮·····	198
第四节	汉赋流变与儒道思想·····	229
第四章	中兴期 ·····	238
第一节	儒士文化与文学的复兴·····	239
第二节	谶纬氛围中神学与文学之关系·····	252
第三节	疾虚求真：《论衡》文学思想的主旨·····	263
第四节	班固论文尚雅崇实的理论建树·····	286
第五章	衍变期 ·····	303
第一节	儒道绌补催发文学观的衍变·····	304
第二节	王逸与汉代楚辞学·····	320
第三节	政治、宗教对文学思想的影响·····	335
第六章	觉醒期 ·····	346
第一节	文士的兴起与文风的扭转·····	348
第二节	社会批判思潮下的文学倾斜意识·····	368
第三节	诗学的会通与拓展·····	379
第四节	汉末诗潮的情感表现·····	390
第五节	建安文学——汉代文学思想的终结·····	401
参考书目	·····	408
后记	·····	420

绪 论

历时四百二十六年的汉王朝，以雄张的国力、壮盛的气势占驻了我国历史之辉煌一页，其延续秦代又发生巨变的社会组织与文化形态，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基础。而作为人类心灵之表现的文学以及其所体现的思想，亦因包孕于这一时代心理而显现其历史意义和审美价值。

一

汉代文学思想作为中国文学思想史的一个阶段，既具历史的承传性，又有时代的独立性。

在纵向的承传意义上，汉代文学思想所显示的意义最明显、亦最抽象地表现于汉人对“文”的认识和理解。汉人论“文”，有“文学”“文章”之分。其言“文学”，基本延承先秦儒家“文学”等同“学问”之意。^①《汉书·董仲舒传》载仲舒对策：“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重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武帝纪》载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诏云：“故旅耆老，复孝敬，选

① 《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荀子·王制》：“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豪俊，讲文学。”“文学”实等同学问或经学。对此，颜师古注《汉书·西域传下》“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为文学者”云：“为文学，谓学经书之人”，阐释甚明。汉代官吏登用科目有“贤良文学”一项，亦取此意。这充分反映了汉代文学与经学紧密联系和文学政教意识极端强烈的历史状况。虽然，“文学”观念的转化，即由与经学同义向意味着以诗文为中心之创作的转化至汉魏交变之际方迹象明显，^①但在汉人对“文”的理解中已蕴涵着这种企向，其突出表现于汉人的“文章”概念。在历史上，“文章”一词本义是指采色或花纹，《诗·小雅·裳裳者华》：“我覯之子，维其有章”，即此意向。乃至春秋末孔门言述，“文章”又多泛指“六经”或“礼乐制度”，^②所谓“华靡”“言辞”之文，尚幽隐难辨。到了汉代，“文章”之意在承袭先人思想的同时已有向语言表现之文追求的明显突破。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序》引公孙弘议奏：“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这里的“文章尔雅”，既有同于经术的一面，也有包含语言表现之准确完美的意义。后一种倾向到班固笔下更为鲜明。《汉书·公孙弘卜式倪宽传赞》：“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肖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再《地理志下》：“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

①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王粲传》：“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

② 《论语·公冶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何晏集解：“章，明也。文彩形质著见。”邢昺疏：“夫子之述作威仪礼法有文彩，形质著明。”朱熹集注：“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

下。”又《扬雄传》：“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均属专指。略长于班固的王充在其《论衡》中亦屡用“文章”一词，如“学士有文章，犹丝帛之有五色之巧也”（《量知》）；“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扬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称不由人”（《书解》），皆包举汉世文体，突出语言表现，深启魏晋六朝“文章”之意。刘歆《七略》、班固《汉志》专设《诗赋略》，正此观念转化之一象征；而从汉宣帝论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汉书·王褒传》引）的双重作用到曹丕“诗赋欲丽”（《典论·论文》）的审美追求，又为其文脉源流演进之理论现象。

总观汉人有关“文”的论说，既是先秦广义之“文学”的传承，又是后世纯文学观念形成之肇端，而正确理解这两层意义的互补和作用，势必落点于这一特定的时代范围与其文学思想的构成。

二

从历史的线索鸟瞰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思潮，汉代是第一个波澜壮阔的时期。可以说，是汉代使产生于先秦以“文”统摄一切人文艺术活动的主文精神得到总结和发扬，也是汉代使笼含于人文艺术活动之“文”在连续与破裂中逐渐诞育出以诗赋为主的相对独立的文学观念。在总体趋向上，汉代文学沿着诗、骚两大传统演进，而在具体意义上，这种演进又首先决定于汉代文化真正结束战国纷争、“道术将为天下裂”局面而形成的兼融统一态势。

汉代大一统文化的形成，一方面是对先秦地域文化的兼综，这里包括邹鲁、荆楚、燕齐、秦晋、巴蜀、吴越文化和远通异方引入的西域文化等；而究其大势，是南北文化的融通。一方面是

对先秦产生于地域文化的学派文化的兼综，如司马谈所论“六家”（道、儒、墨、法、名、阴阳）、董仲舒以尊儒为主兼取众家之思想体系的形成，为其征象；而究其主流，又是儒、道思想的融通。而在这种文化机制中，代表北方文化的儒家思想与代表南方文化的道家思想的绌补，决定了以“教化”为中心的儒家审美和以“自然”为旨归的道家审美成为通贯汉文学观的两大思潮。

儒家审美思潮是推动汉代文学思想发展的主要精神。它以政治的、伦理的、道德的力量紧扣汉世文人的心弦，又以道德与艺术合一的观念成为汉代文学思想的基调。在汉代，文学思想的变迁与儒家经学的盛衰有密切关联，尽管这种关联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政治的递嬗兴废有所更化，然在汉人思想中“儒经——文学”的理论模式，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种理论模式的思想核心，是汉人遵循的符合社会意志的文学教化意识，它突出表现于这样三点：一是以仁义为本寻求文学之性情；二是以礼乐制度规定文学之审美范围；三是以致用精神倡扬文学之美刺功用。据此思想范畴和基本情态，儒家审美思潮无论在汉初黄老之学统治期陆贾论文“称《诗》、《书》”（《新语·道基》），在汉代文化鼎盛期董仲舒所谓“因天地之性情”“利五味，盛五色，调五音”“以感动其心”（《春秋繁露·保位权》），还是在汉末社会批判风潮下文学对社会的干预，都能于不同的视角推阐其一贯的精神。

与之相比，道家审美思潮对汉代文学思想的渗透显出时代的疲弱、衰落特征，这一则与道家文化哲学观起于乱世的历史渊源有关，一则因道家思想对汉代文学思想的影响是以儒经文化群体意识衰颓为前提的。缘此，在汉代文学思想中道家审美相对集中体现于西汉初年、两汉之际和东汉后期，即由汉初崇尚自然、真朴的文风发展到两汉之际儒家文为经世、翼教明道的精神与道家

崇尚自然、淡泊自守的精神构成互为矛盾、互为影响的双重主旋律的出现，再到汉末文人在对文学教化观有负重感的心境中其审美趣味已企向于老庄遗风的变化，形成一条清晰的线索。尤其是汉末文人处衰乱之世为排解命途坎壈的困惑，或心冀玄远，颐养天年；或抽身远翥，潇洒游适；或缘情求性，旷怀惬意，皆受道家审美之临照浸染。这对汉世纯文学观之成立殊为重要。

由于儒、道哲学均追求有限的自我超越，以体悟心灵的无限崇高的状态，孔子所谓的“仁”，老子、庄子所谓的“道”，正此境界。而孔子说“逝者如斯，不舍昼夜”，老子说“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庄子说“唯达者知通为一”，又是以一贯通无限的境界来容纳万千气象，此亦汉人融合儒、道审美的心灵超拔。同样，孔子所赞美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精神风范和老子所倡扬的“得至美而游乎至乐”^①的人生乐处，亦为汉人追寻的审美理想。但是，也因为汉儒积极参与建构国力雄张、物质繁盛的外部世界，致使那种在强烈功利思想支配下的外王倾向掩盖了人生品格的内塑，因此，随着国力的几度衰萎，士子为了寻找人生与自我，道家思想作为一种反拨与补充则起着越来越大的功用。^②

明乎此，方能进一步探究汉代文学思想之内涵。

① 《庄子·田子方》载：孔子问老聃何谓“游心于物之初”，老聃答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云：“中国思想的两个主要趋势道家和儒家的根源，它们是彼此不同的两极，但又是同一轴杆的两极。……中国哲学的这两种趋势，约略相当于西方思想中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由此亦可见楚骚审美在汉代文学思想的突出现象，与道家审美不仅有地域文化（同出于南方）渊源联系，亦具艺术精神的同一性。

三

汉人的学问因建立在对先秦典籍整理、研究的基础上，故其文学思想也就表现出对历史文化的解释特征；先秦诗、骚传统在汉代的影响、消释，以及汉人对诗、骚文学的理解、论评，构成汉文学思想的主要范畴。

同时，汉代又是文学蓬勃发展的时代，刘熙载说“西汉文无体不备”，所谓“纯粹、磅礴、窈眇、昭晰、雍容”（《艺概·文概》）；刘师培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中国中古文学史》），两说稍异，然兼述文体、文风之繁茂，亦可见汉代文学地位之隆盛。^①因此，认识汉代文学思想的内涵，又必须重视汉人的创作审美经验，从而于其作品创作、鉴赏抽象提炼其理论精神。

有关汉代文学创作的实绩，昔人谓“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钟嵘《诗品》），说明了诗歌艺术在汉代相对沉寂的原因。但是，倘若结合汉代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两方面加以考虑，汉代文学思想又是以诗学为核心的。

汉代诗学是汉文学思想之实用、审美的标本。这在社会文化现象上，表现为《诗》在汉代“五经”中最先尊为“经”，立有博士，其地位在汉文化鼎盛时的武帝朝被无限提升；在文学思想内涵上，《诗》之“美刺”与“讽谏”，成为衡量汉代文学价值的基本准则。程廷祚认为：“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两端。”（《青溪集》卷二《诗论十三·再论刺诗》）此于汉初齐、鲁、韩三家诗已见端倪。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序例》云：“《诗》有美有

^① 梁·任昉《文章缘起》举诗文体八十四类，缘起于汉代有六十四类。明·陈懋仁作《续文章缘起》，又历述千年诗文体七十类，汉代独创二十五类。

刺，而刺诗各目为体：有直言以刺者，有微词以讽者，亦有全篇皆美而实刺者。”这种“美刺”“讽谏”在理论上遥契孔子“无邪”诗旨，在方法上直承孟子言诗“以意逆志”，以标明所推作者之“意”与所逆诗人之“志”的思想指向。^①汉代诗学之美刺，至《毛诗序》的理论演化大其堂庑。其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谓“志”，既关国家之治乱，又怀一己之穷通；其中“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教作用和由此生发的对《诗》之“风”“雅”“颂”的诠释，奠定了汉代诗学批评的基本形态。到了汉末，郑玄于时代制高点上会通和发展汉代诗教理论，他一则认同《毛诗序》对“风”“雅”“颂”的解释，一则又补充了对“赋”“比”“兴”的阐述：“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周礼·春官·大师注》），从而完成了汉儒的政教诗学体系。而此诗学的“美刺”“讽谏”辐射于汉代一切文学批评，又形成了具有更广泛意义的时代文化特征。

在汉代，诗歌创作思想基本上是围绕《诗》学观这一中心轴的。但作为创作，诗歌又是抒情写意感发情怀的艺术，所以它显示的审美经验和由此汲取的理论精义，显然又有自身的思维定势和建设意义，并与汉代《诗》学相辅相成。从创作形态上来看，汉代诗歌在继承《诗三百篇》“四言”“杂言”的形式外，又有

^① 陈乔枬《韩诗遗说考序》评韩诗：“上推天人性理，明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下究万物情状，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考《风》《雅》之正变，知王道之兴衰，固天命性道之蕴而古今得失之林。”系对诗学“仁心”的阐发。

“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等创制，^①特别是渊源于民间歌谣的五言诗经乐府的演化向文人诗的升进而在汉世的兴起，^②展现了汉代诗歌创作审美世界。因此，探考汉代诗歌创作思想，西汉盛世之“乐府”（经乐府机关加工的民歌）与东汉末世之“五言”（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为两大重镇。乐府诗的基本创作思想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因于“感于哀乐”，揭示诗人之“志”；因于“缘事而发”，展露诗人之“情”。这种“志”与“情”虽然是通过作者主观感受的介入而再现现实生活和表现人生情感，显出与汉代《诗》学研究的距离，但是，如果我们打破时间的隔膜，将汉代《诗》学对象“三百篇”的创作真情与乐府诗的创作真情衔接起来认识，又可见其“出诸里巷妇女之口者，情词婉曲”（李开先《词谑》）的情感特征正同汉代立乐府之制以“泄导人情”，“观风俗，知薄厚”的政教意识切合，乐府之“怨”与风诗之“刺”是不同时代的同一思想产物。而汉代诗歌创作发展到汉末，出现了《古诗十九首》这样的人生情感的大曝光。这种由东汉 中叶以降文人之个性情感意识从潜滋暗长到汪洋恣肆的汉末诗

① 《汉书·东方朔传》载朔有“八言七言上下。”又，《后汉书·班固传》：“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按：汉世云“六言”“七言”“八言”同“诗”别立，然其实质仍为诗，此前人已有定论。

② 按：汉代七言诗虽已较早出现，但因入乐府较五言晚，故未光大。关于七言诗的起源，有“楚辞”“歌谣”两说。余冠英《七言诗起源新论》（见《古代文学杂论》中华书局1987年版）主“民间歌谣”说，论之甚详。程千帆《先唐文学源流论略·乐府歌谣与五七言诗之成立》（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兼溯五、七言诗之源皆出于“民间歌谣，率以当时入乐而得流传后世”，“故兹欲溯五七言诗之缘起，当先知乐府之概况。”尤为全面。

潮，一则与汉儒说诗的政教思想发生更大的偏差，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以“情”为主体的表现理论，一则又以其社会人生的强烈愤情与汉代《诗》学之“美刺”主旨有着不可分割的精神默契。可以认为，正是从乐府歌诗之“缘事”到汉末古诗之“缘情”的连续演进，使我们感受到汉诗创作与《诗》学理论的某种悬隔，但也正因为这种悬隔的存在，又使我们于两种表象不同的文学现象产生于同一文化机制这一事实，去反思体悟一代诗学思想之整体的通贯性和深层意蕴。对此，我以为有两点应着重提出：

其一，汉代诗学表现的是时代整体精神，而这种精神随着时代逐阶段的变迁又呈示出相对的流动性。试以《毛诗序》为例，它的理论一方面继承了汉初三家诗的讽谏传统，一方面又拓宽了汉初诗学的美刺思想，而显示盛汉大文化之征象。这种理论的内涵主要表现出三点：一是倡“变风”“变雅”说，确定了“刺”诗是汉代诗学的主导精神；二是将诗学中灌注了盛汉“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的时代气息；①三是通过对“风”“雅”“颂”的诠释使政教诗论系统化。理解了《毛诗序》在汉代诗学中的划时代意义，也就可以理解武帝朝广泛搜采民歌入乐府所表现的感于哀乐之情和有助教化之用的时代统一性。同样的道理，由《毛诗序》确立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论思想经汉文化的解体，其重“礼”的一面受到汉末诗潮之“情”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在当时维护儒家诗教传统的郑玄诗学中也留下深刻的印记，其突出表现于他对“刺”诗的理解由“哀”而“伤”，由“怨”而“怒”的发展，对诗歌抒情性（诗长人情）、形象性（假象兴意）的高

①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疏解《毛诗序》“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等句云：“一人者其作诗之人，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也。……言天下之事，亦谓一人言之。诗人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而咏歌王政。”

度重视。这又是汉末文士个性自觉的时代思潮使然。

其二，汉代诗学阐发的是人的性情，这种性情虽随着时代逐阶段的变迁出现不同的表现形态，然其思想本质却显出相对的稳定性。关于这一点，钱穆有段精辟论述：“学者于诗，对天地间鸟兽草木之名能多熟识，此小言之也。若大言之，则俯仰之间，万物一体，鸢飞鱼跃，道无不在，可以渐跻于化境，而岂止多识其名而已哉。孔子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乃所以广大其心，导达其仁，诗教本于性情，不徒务于多识也。”^①所谓“大言”之“性情”，具体而言便是学者以民为本假《诗》言理的精神。这种不“枉道以从势”（《孟子·滕文公下》）的精神在先秦儒家诗论中已有诸多表述，而至汉代，除一些“曲学以阿世”的利禄之辈外，实一灯相传，为诗学之神髓。陆贾“《诗》以仁义存亡”（《新语·道基》）；贾山“以直谏主，不避死亡之诛”（《至言》）；董仲舒明孔子作《春秋》用意“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史记·太史公自序》）；郑众注《周礼》谓“讽诵诗”“以刺君过”；郑玄《六艺论》指出“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虽或随时随意发挥，而不追寻诗之本义，但以《诗》为“谏书”，^②既为汉代诗学之一核心，又衍射于汉代楚辞学、汉赋学理论。

四

与诗传统并称的楚骚传统对汉代文学思想形成的影响，既表现于汉人大量的拟骚诗赋的创作，又表现于汉人对屈原与楚辞的

^① 《论语新解》，钱穆著，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15页。

^② 《汉书·儒林传》载王式语：“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